

苗棟著



「明帝列传」

崇祯帝 皇帝传

上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前 言

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过许多次盛衰兴亡,于是也有了许多开国立业的君主和丧乱亡国的君主。有趣的是,开国之君的伟大大体都是一个模式,而亡国之君的遭际却往往极具特色,各有各的不同。在形形色色的亡国之君中,明末的崇祯帝显然又是最具特色,因而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因为至少从表层现象来看,这个崇祯帝根本就不具备人们通常以为一个亡国之君应该具备的那些特征。

难怪明末的遗民们会为此发出许多感慨。

暮在《甲申传信录》卷一中说:“上英谋天挺,承神庙、熹庙之后,励精图治,駸駸然有中兴之象。然疆场外警,中原内虚,加以饥谨荐至,盗寇横出,拮据天下,十有七年,神器遽移,遂死社稷。呜呼!英谋睿虑,曾不一施,其留恨又何极也!”他对于崇祯帝的死和明朝的亡国表现出极大的遗憾之情,而且显然认为,“英谋天挺”而又“励精图治”的崇祯帝对于明王朝的覆灭并不负有什么主要责任。

邹漪的《明季遗闻》序中则把崇祯皇帝与历史上一些失德丧邦或是导致国家衰败的君主们作了比较,更觉得明朝亡在崇祯帝之手实在是很难理解的事情。这篇序中说:“先帝以圣明在御,旰食宵衣。比之太康之尸位,厉王之内嬖,哀、平之外戚,惠帝之昏弱,明皇之淫荡,道君之放逸,百无一似,谓宜治平立至。而逆寇犯阙,身殉社稷,言天言人,都不可信。”既然崇祯帝要比夏朝的太康,周朝的厉王,东汉的哀帝、



平帝，西晋的惠帝，甚至风流倜傥的唐玄宗和宋徽宗，都要强得多，完全没有他们身上的那些毛病，为什么亡国的灾难还要落在他的头上呢？

的确，不论是同历朝历代的君主们相比较，还是同明朝的列祖列宗们相比较，崇祯帝都不能算是一个很差劲的皇帝。他好学勤政，严于律己，人也相当聪明干练，具有这样全面素质的帝王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实在是并不多见的。但他生不逢时，正好赶在一个最不利于实施统治的时代登上了君临天下的宝座。

在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中，一直有两大主题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是多年相对安定的社会生活必然会造成人口的膨胀，而当人口总量超过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所能承受的限度的时候，就必然会产生以人口危机为前导的巨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危机的总爆发酿成灾难性的大乱，其结果是通过饥荒和战争等恶性手段大量消灭现存人口，首先解决了人口危机，而后在这个基础上重新筑造治世。另一个主题表现在文化方面，承平日久和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往往使得以中原统治阶级为承载主体的中原文化在多年治世之后表现出严重退化的迹象，于是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世风绮靡、武备孱弱；这种古代的“过度文明”症状同样会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往往要通过一个或数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军事集团对中原的进犯和蹂躏才能得到解决——清新的“野蛮精神”给中原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接踵而来的也许会是一个文治隆隆武功赫赫的盛世。

而在17世纪上半叶，也就是崇祯帝策御宇内的时候，中华帝国却正好处在一个最敏感的危急时刻。此时，明帝国的人口密度按当时情况已经达到超饱和的程度，而长年的干旱



和平均气温下降,造成的农业生产衰退更加重了人口危机的烈度,开始出现连年不断的全国性大饥馑。这是一种明王朝自身机制根本无法解决的灾难性危机,因而尽管崇祯帝和他的大臣们也绞尽脑汁,却无论如何也缓解不了越来越严重的大饥荒,也无法扑灭由饥荒引发的农民大暴动。在崇祯帝17年的统治中,他一直对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代表的所谓“流贼”充满了刻毒的仇恨和绝望的恐惧,却很少清楚地意识到,在农民起义者背后决定着明王朝最后命运的正是谁也無法摆脱的饥饿之神。

同样,这个时候,明王朝的“过度文明”症状也已经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崇祯帝上台之前,明王朝刚刚经历了魏忠贤专权的灾难性事变,那段为时不长的“黑暗时期”,其实恰恰反映出明王朝在整体上已经极度腐败。崇祯帝在铲除掉魏忠贤集团之后,却不得不继承那个集团给他留下的全部政治遗产,其中包括一整套僵化、繁琐、效率低下的政治结构,朝臣间激烈而又毫无原则的党争,制度化了的普遍贪污腐败,荒谬的军事体制和由它造成的武备的极其衰弱无能,国家各级财政的极度拮据……,也包括明末士大夫只知一味高唱理学的道德至上高调,(奇怪的是与此同时士大夫们,甚至许多大理学家们的道德水平相当低下)对于经邦治国却毫无能力可言。中原文明的衰败给了边疆少数民族部落极好的机会,这个机会被满洲军事贵族抓住了,在一次次对明王朝这棵大树进行过无情砍斫之后,皇太极的继承人终于进入了北京,成为“天下”的统治者。

在崇祯帝上台的时候,他的帝国即将灭亡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这也许是其悲剧的基本原因。对此,许多人就归结为“天命”或是“国运”,而崇祯帝本人则强调“朕非亡国之君,



臣尽亡国之臣”。但他本人真的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对于这一点，清代的历史学家们已经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胡智修在《居业堂集》卷二十中说是“烈皇所以被诬者四：曰自用，曰愎戾，曰吝，曰用宦官”。所谓的“诬”其实就是时人为崇祯帝总结的主要弱点。距离明亡时间较远因而也能持比较客观态度的全祖望更明确地指出：“庄烈自言：朕非亡国之君。夫其忧勤明察，固不可谓为亡国之君，然性愎自用，怙前直往，自亦不能辞于亡国之咎。大抵庄烈召祸，内则退宦官而不终，外则吝于和议。……”（《鮚埼亭集》卷二十九）从政策的角度来讲，全氏认为崇祯帝主要有任用宦官和不能同清朝和谈两大失误，这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而在个性或者说政治作风方面，“性愎自用，怙前直往”和清初人们普遍评价的“自用”、“愎戾”则完全是一致的。

在深入接触文献材料之后，每个人都会对崇祯帝的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固执多疑和刻毒残酷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如果将崇祯帝的性格特点追溯到他的幼年时代，我们就会发现那些个性其实本来并不算怎么恶劣，在一般人身上顶多是无伤大雅的小毛病罢了。可怕的是，这些本来并不算十分恶劣的性格特征，一旦同专制皇帝的绝对权威结合起来，却变成了一种令人震惊的破坏性力量。崇祯帝作为一个历史上少有的积极有为的皇帝，又把他自己的人格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崇祯帝的这种积极精神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有些古代学者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如果在明末天子宝座上的是一个比较昏聩无能的皇帝，例如万历或是天启那样的皇帝，明朝的国祚也许还能再苟延一段时间。

因积极振作而误国而亡国，这本身就是个足以令人震惊的话题，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难免就会牵扯到对于君主专制



制度的批判。17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黄宗羲就是在含着血泪总结了亡国痛史之后,才写出那部著名的《明夷待访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理性的批判,勇敢地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因为“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故而“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原君)

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一点没有提到崇祯帝和他的历史教训,这或许是出于一种难以克服的遗民情结。但从其内容来看,却不难找到崇祯朝事的影子。黄宗羲在《置相》一章中提出用相权限制君权,提出人臣要做君主的“师友”,要“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就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崇祯朝五十宰相昏昏碌碌,奴颜婢膝的实况。而在《学校》一章中所言的“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和关于“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的大胆政治设想,显然也是深深有憾于崇祯时期天子刚愎自用,以致杀身亡国的惨痛记忆。

一个早在300多年前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专制帝王的故事,大概正是从以上的角度讲,对于我们的现代生活,还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苗 隼

1995.2.7 日于美国



目 录

第一章 平步青云上九重	1
第一节 深宫少年	1
第二节 信王殿下	22
第三节 初登大位	42
第四节 拨乱反正	63
第二章 守业艰难百事多	84
第一节 会推风波	84
第二节 己巳之警	108
第三节 西北烽烟	130
第四节 朝中朋党	152
第三章 励精图治总无期	173
第一节 刚明求治	173
第二节 下诏罪己	198
第三节 君臣之间	222
第四节 战和两难	246
第四章 烽火惊传事日非	271
第一节 三十而立	271
第二节 枢辅督师	291
第三节 江南复社	312
第四节 松山败绩	335
第五章 生于末世运偏消	357
第一节 绝处图强	357



第二节 土崩瓦解	381
第三节 煤山惨雾	404
第四节 遗胤余波	429
附 录 崇祯帝大事年表	450



第一章 平步青云上九重

第一节 深宫少年

明万历 38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11 年 2 月 6 日),京城里鞭炮声此起彼伏。这天是立春的日子,又接近岁末,人们刚刚在严寒中祭过能够上天言好事的灶神,正忙着准备过年。紫禁城里的嫔妃和宫女、太监们也都随着新年的临近而忙碌兴奋起来,蒸点心办年货,裁绸缎制新衣,贴春联剪窗花,宫里还要设鳌山,扎彩灯,备办烟火,真是热闹非常。就在这一片喜庆热闹当中,一个男孩在紫禁城东华门内的慈庆宫里呱呱坠地了。

男孩的父亲是慈庆宫这组庞大建筑的主人,当时的东宫太子朱常洛。朱氏家族统治明朝帝国已经 200 多年,到万历年间更换过 13 个皇帝,新诞生的婴儿是太祖朱元璋第 11 世孙。在 200 多年间,太祖朱元璋家族的子孙十分兴旺发达,此时各支各脉的男性皇族宗室已多达 60 万有余,但每一位宗室成员由于同代代相传的皇朝天子血缘关系远近不同,地位悬殊,有着天壤之别。远支别脉的小宗子弟衣食都没有着落,有些人年过半百还娶不上妻室;而大宗的亲王、郡王们却



拥有数万顷良田的资产，在王朝中有着至尊至贵的崇高地位。作为太子的朱常洛在整个宗族以及天下百姓之中又是地位仅次于当今天子的第二号人物，一旦万历帝去世，他就将继承皇位成为帝国最高的统治者。

但这位当今皇帝的法定继承人此时的心情却并不愉快。因为尽管在生活上有洞房清幽、锦衣玉食，身边又是妻妾成群、仆婢盈堂，但他总是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皇储地位并不稳当。他的父亲明神宗万历皇帝朱诩钧明显地不喜欢这位长子，而且宫中朝中乃至京城的市井之间，近年来一直都在流传着一些听起来不像是全无根据的流言，大体上都是说皇帝和他宠爱的郑贵妃想要找机会废掉现任太子，改立郑贵妃亲生的皇三子福王朱常洵。有些流言甚至有鼻子有眼地勾勒出郑贵妃一党阴谋活动的各个环节，让太子宫中的上下人等听了难免有些不寒而栗的感觉。

2

虽说是处在有点朝不保夕的焦虑之中，但年还得过，而且得了一个儿子毕竟还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太子这年已经29岁，^①正妻太子妃郭氏没有生育子女，另外几个侍妾却为他生了不少子女。最近一个出生的儿子排行第五，生母是在太子宫中地位相当低微的一个小妾刘氏。生母地位的微贱和在兄弟排行中的劣势，似乎决定了这位新生的小王子不会有有什么了不起的远大前程。根据明代的宗室封爵成例，如果朱常洛最后终于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他的全体儿子除了由最年长的继承帝位之外，都要封为亲王，但也仅止是亲王而已，照例要远徙他乡，严禁干政。‘由于这样的原因，慈庆宫里趁着过年的机会，为这次弄璋之喜小小地庆祝了一下，但比

^① 按本书中所提到年龄，除特别指出者外，均系当时习惯使用的虚岁。



起当年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出生时张灯结彩的一番热闹相差得很远，紫禁城中其他宫廷院落里忙碌着的人们，对于这件事也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小王子正好在立春这一天出生，如果是在民间，或许会因此得到一个“春生”之类的乳名。但皇家体制森严，没有民间那些世俗的习气，在这个男孩出世后不久，宗人府就根据太祖皇帝钦定的子孙排行字序为他择定了一个郑重其事的嘉名，叫做朱由检。

在幼年，小王子朱由检一直生活在一种沉闷而又冷峻的气氛中。太子地位不稳定造成的人心惶惶使东宫中的姬妾、宫女和太监们宁可明哲保身，尽量少出头少说话；前途的莫测又加剧了宫廷中本来就层出不穷的勾心斗角、相互仇视和中伤。这位小王子也算是命途多舛，他的生母刘氏并没有因为给太子生了儿子而母以子贵起来，反而在哺育儿子的期间遭到太子的冷落与厌恶。刘氏为此郁郁寡欢，竟然积郁成疾，在她的儿子才只虚岁5岁（实际只有3周岁）的时候，就抛下了亲生骨肉，死了，当时只有23岁。

小王子自有乳母喂养着，而且太子还指定了一位宠妾李选侍（康妃）作为这第五个儿子的直接监护人。但缺乏生母之爱还是给这小王子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十几岁上，他受封为信王，曾经留意向宫中的老太监打听：“听说生母刘老娘娘葬在西山申懿王坟附近，你知道吗？”^①老太监说知道，他就拿出银两，秘密派人前去祭奠。后来登上帝位，他隆重地追封生母为孝纯皇太后。此后，又急切地想要找人画出生母的遗容——因为无论他对于亲生母亲怎样思恋怀念，却没有办法靠着幼时的记

^① 刘若愚《酌中志》，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卷4，上册，第25页。



忆为自己提供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仍然是由几位老太监在宫中选择了一个相貌较为相似的宫女作模特，再凭着回忆指点，总算绘出了一幅刘太后的遗像。他的外祖母刘老夫人那时候还健在，见到画像认为也还说得过去。崇祯帝对着遗像大哭了一场，才算了结了自幼留下的遗憾。

4

太子朱常洛总共有过7个儿子和10个女儿，分别出自他的一大批侍妾，但这十几个儿女中的大多数都在婴儿时期就夭折了——宫中虽然奢华富有，医疗卫生条件却并不比民间好多少，婴幼儿的死亡率极高，哪一位龙子龙孙或是金枝玉叶能够坚持到长大成人，全凭运气。在朱由检童年的生活中，可以算得上兄弟伙伴的只有大哥朱由校（后来的天启帝）、三哥朱由楫，以及后来封为乐安公主的小妹妹。但几个兄弟都被各自的生母或是养母把持着，作为日后兴旺发达的政治资本，每个人身边又都簇拥着一大群宫女太监，相互间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往，也没有机会像百姓家的小孩子那样集合在一起玩耍打闹。对于一个孩子来讲，没有童年的伙伴，本来就十分寂寞难耐的深宫生活更显得沉闷无聊。

在生母刘氏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万历43年（1615），慈庆宫里却突然发生了一件引起极大轰动的事件，打破了深宫的沉寂。

那年五月初，宫里正在忙着准备过端午节的时候，一个手持枣木棍的中年男子不知怎么混进了东华门，突然窜到慈庆宫的门前。此时太子正好没有住在宫里，因而宫门的防卫不严，在慈庆宫守门的只有两个六七十岁的老太监。那汉子不顾门卫的阻拦，用木棍打伤了值班的两个老太监，径直闯进宫里，到了正殿前才被蜂拥而上的太监们制服。闯宫的汉子立即被押送到刑部进行审问，得知，此人名叫张差，35岁，



是蓟州(今天津市蓟县)一个无家无业的游民,平日靠砍柴卖草为生,至于这次闯宫的目的和背景,他交待得语无伦次,前后齟齬。在历史上,各朝各代这类莫名其妙的擅闯宫禁事件层出不穷,大体上以精神或是智力方面有缺陷的疯傻人员居多。初审的刑部司官们也就依照疯子闯宫的路子,在所录供词中强调主犯的“按其迹,若涉疯魔”,^①希望就此了结此案。但这一次的事件(后来被称作“梃击案”)因为涉及到了太子地位不稳这个极其敏感的背景,立刻就引起了朝廷上下猜疑四起,终于纠集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政治死结。

崇祯帝的祖父万历帝有8个儿子,但没有一个是正宫皇后所生,按照传统的宗法制继承原则,“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朱常洛才被立为太子,成为法定继承人。朱常洛的母亲本来是万历帝生母李太后宫中的一个宫女,生出这位皇长子完全是事出偶然,并非真的得到了皇帝的宠爱。万历帝喜欢的是郑贵妃,两个人情意绵绵,而且那爱情持久、执着,至死不渝。郑贵妃也为万历帝生过两个儿子,皇三子常洵和皇四子常治(另有一个皇二子少年即夭折)。万历帝很想立郑贵妃所生的常洵为太子。这样,皇帝的意图就同传统的礼法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不论儒家的经典理论还是列祖列宗的实践,都明确规定了“无嫡立长”的继承原则。对于儒学的信徒和皇朝的忠臣来说,这一原则具有绝对真理的性质。但是皇帝竟然想违背这一原则,在朝臣看来,就是溺于私情,很不光彩,很不道德,而且对于政治局势有着极大的破坏性。为了申张天理,也为政治的稳定,朝臣们同皇帝的荒谬意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因为事关太子的

^① 文秉《先拨志始》,上海书店1982年12月版,卷上,第121页。



确定,而太子是嗣君,被认为是国家之根本,所以这场斗争被称作“国本之争”。这“国本之争”大约从万历 14 年(1586)起直到万历 48 年(1620)光宗继位,前后断断续续地闹了 30 多年,给明代后期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极深远的影响。

在“国本之争”中,坚决站在立长原则一边,同皇帝进行无情斗争的,是一群在朝廷中虽然地位不太高,但是势力浩大的自命为“正人”、“清流”的文官官僚。由于这个集团中的首脑人物顾宪成等人曾在家乡无锡的东林书院中聚众讲学,当时又称他们为东林党人。

早在万历 22 年(1594),去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同他的好朋友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就在无锡宋代的东林书院旧址聚众讲学,一时名声大噪。许多在野的士绅闻风向附,以至于书院的学舍常常拥挤不堪。东林书院名义上是探讨经义,讲求学问,真正关心的却是时事政治,在书院的楹联上也分明写着: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书院在学术上高谈性理,以维护和发扬光大程朱理学为己任,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他们认为,时代自中叶阳明学兴起,程朱理学就开始衰微,于是人心世道都变得越来越坏,因而需要在士大夫中大力倡导光复理学,恪守儒家正统道德,用天理来纠正人心的偏差。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们对于自张居正以来出现的内阁集权的倾向非常不满,以为内阁的“擅权”造成小人争权竞进,严重损害了士大夫阶层的整体利益,也给国家和天子的权益带来损失。有一次顾宪成去拜访内阁大学士王锡爵,王锡爵对他说,近来朝中有一件怪事,“内阁以为对的,外论必以为非;内阁以为不对的,外论必以为对。”顾宪成却回答说:“外间也有一件怪事,外论以为对的,内阁必以为非;外论以为不对的,



内阁必以为是。”^①两个人相对一笑而罢，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上的对立却表露无疑。

东林书院的主持者和参与者以及在全国各地同他们志趣相投，声气相通的人，再加上他们在朝野上下的支持者和同情者，逐渐形成了一个宗派。大体而言，这个宗派中人多是一些注重道德修养的正人君子，在政治生涯中一般却并不太得志。既然有了宗派，他们在有意无意间就会利用各种手段为自己的宗派争取利益，特别是政治权力，于是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那些对东林宗派很不以为然的人就送给他们一个名目，叫做“东林党”。

“党”这个字在古代是有明显贬意的，是指朋党之党，结党营私之党。东林党人自己只称东林，从来不说自己是党。这个东林党也不同于现代政党，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组织，成员也没有严格界限。只要是观念同东林一致，在政治斗争中站在东林一边，或是同东林人士有些门生故旧、亲朋好友一类密切关系，都可能会被划入东林一党，许多人也就因此以东林党人自居。但东林党人中占比例最大的还是号称文明繁华之区的江南一带的士绅，特别是苏州、淞江（大体相当于今上海市的范围）、常州三府的士绅，因此东林党人在政治方面的要求常常体现着江南士大夫的实际利益。这样一个松散的集团中包含了不少社会名流，也有些是达官贵人，社会影响和政治实力都在日益增强。

那些在观念上与利益上同东林党相冲突的人，反过来也被东林人士看成“奸佞”，叫做“邪党”，在不同的时期又有“齐党”、“楚党”、“浙党”等不同名目。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东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版，卷58，下册，第1377页。



林党人与“邪党”之间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争斗不休，朝中的官僚也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别。两个政治派别的隔阂越来越深，到后来，所谓“正”、“邪”两派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不论大事小事，原则问题还是非原则问题，双方都要赌气相争，朝廷自然也就被闹得乌烟瘴气。到万历后期，朝中党争已经成为一个对国务活动破坏性极大的问题。

在“国本”之争这个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坚持正统宗法原则的东林党人自然是坚定不移的拥护太子派，并且同万历帝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斗争。而那些所谓“邪党”中的一部分人，却或是希望讨好皇帝捞取政治资本，或是愿意以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来求得君臣之间的和谐关系，往往采取抹稀泥的调和姿态。于是有关“国本”的各种问题都成了万历年间党争的重要话题，东林党的态度执着而偏激，常常还会神经过敏，弄得万历帝本人也十分难堪。

8

万历帝的个性原本是很软弱的，在朝臣的激烈抗争下，他虽然一再拖延、搪塞，还是在万历29年(1601)册立了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这个决定毕竟是在朝臣的逼迫下做出的，所以他始终心怀忿忿，意气难平。为此，他在自己统治的后20年里对朝臣采取了消极怠工的策略，基本上不理朝政，既不上朝接见大臣，也不批阅事关政务的各种本章。由于皇帝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皇帝的怠工自然会给朝臣们的日常政务活动带来极大的不便。朝臣为此屡次抗议，皇帝却依然我行我素，君臣之间的对立由此也就愈演愈烈。

万历帝的反常举动还使得朝野上下产生了极大的猜疑。既然皇帝对于立太子的事情如此耿耿于怀，他就完全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刻改变原来的决定，重新确立太子。由于有这样的猜疑，朝臣们特别是东林党人们对于各种



风吹草动就表现出了近于病态的敏感。他们曾经为了太子的读书问题、福王朱常洵赴藩地问题、京城出现的秘密传单(所谓“妖书”)问题等等,掀起过巨大的政治波澜。这一次,竟然有人提着枣木棍子直接去威胁太子的安全了,当然更加引起了他们的警惕和忧虑。

大多数东林党人根本就不相信“挺击”事件仅仅是一个疯子的无聊之举。根据他们的逻辑,郑贵妃和她的家人以及党羽时刻都在觊觎着太子的位子,每天都在阴谋策划着危及太子的声誉和生命,而皇帝也在暗中默许甚至支持着这些阴谋。既然如此,那个张差能够大摇大摆地手持凶器混进宫中,而且不闯别处,偏偏要闯太子居住的慈庆宫,显然是有人指使有人接应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东林中的骨干分子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案是专门负责管理刑部监狱事务的,他利用职务之便,在刑部对张差进行初审后的第二天晚上在狱中再度进行私审。这次审讯的结果令人十分震惊,张差招供说:他是同乡的马三舅和李外父介绍给一个不知名老公(宦官),由那个老公带到北京,住在一个不知名街道的大宅子里。另一个老公让他“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①并给他一根枣木棍子,领他由后宰门(地安门)进入皇城,混到宫里,后来打人捉云云。这一次的供词里说的仍然带着几分疯傻气,但无论如何,他的闯宫却是有人阴谋主使的!东林党人的猜疑得到了证实。

王之案立即把审得的情况向皇帝作了书面汇报,同时请求万历帝亲自出面再审凶犯,或者至少是由全体大臣共同参

^① 顾秉谦等撰《三朝要典》,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2年版,卷1,上册,第113页。